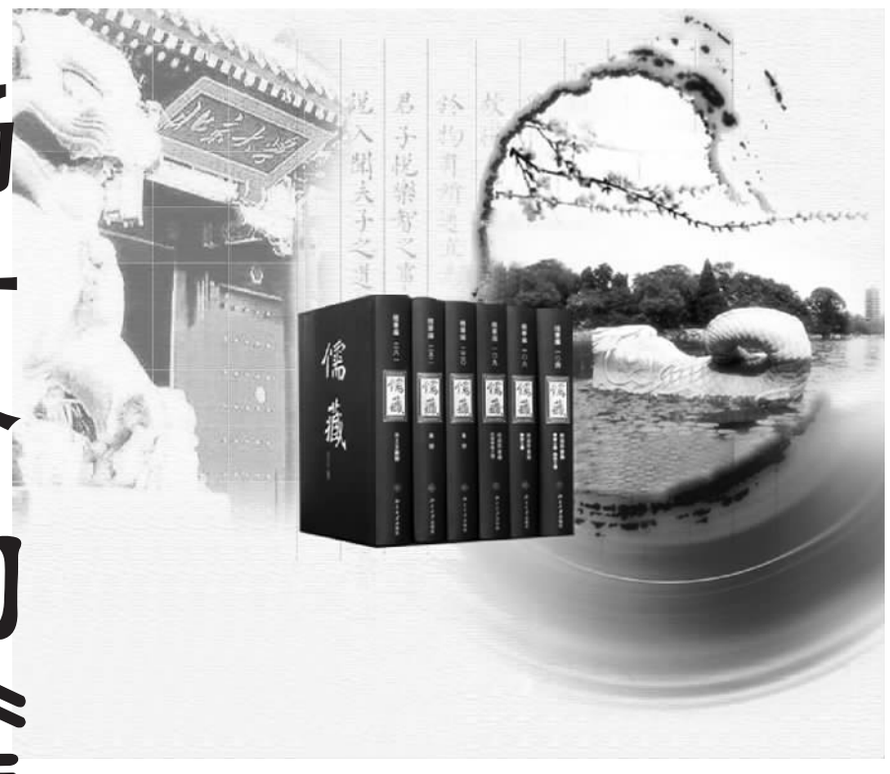
责编：刘 泉 邮箱：mingliuzhoukan@126.com

汤一介的《儒藏》春秋

李娟娟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儒、释、道历来三分天下。但在中国的历史上，却只有《佛藏》和《道藏》，而没有《儒藏》。21世纪初，这一历史终于得以改写，带头人就是著名哲学家汤一介教授。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专门看望了87岁的汤一介先生（下图），同汤先生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赞扬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后湖之滨的朗润园，我国著名哲学家、一代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在这里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

汤一介先生家有两间书房，虽然不是很大，却四壁环书。其中整齐排列的《儒藏》“精华编”格外悦目。

编纂《儒藏》始终是汤一介先生要实现的一个愿望。

《儒藏》工程的首席专家

纵观中国历史，虽然儒、释、道三家并称，但三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它与根源于印度的佛教和后起的道教不同，不是某种宗教的经典，而是中华文明的经典。

由于儒家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感、文化感、道德感，不仅使得历代主政者无不重视儒家的政治、文化功能，而且也使得儒家的价值观逐渐成为中国人价值观的核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因此，把儒家经典及其在各个时期的注解，把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把体现儒家思想的各种文献编纂成一部大文库——《儒藏》，无疑对当今和后世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自宋朝以来，历代王朝都编有《佛藏》和《道藏》，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又编辑出版了《中华大藏经》和《中华道藏》，唯独没有编纂过《儒藏》。明、清两代虽然也曾有学者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但因工程浩大等原因，最终没有能够实行。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极不相称，更不能满足传统文化整理与研究日益广泛深入的需要。

早在1989年秋天，汤一介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我们能做什么”的时候，就提出了编纂《儒藏》的设想。在他的心目中，编纂《儒藏》是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这个伟大的工程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

2002年11月，经过专家的反复论证，汤一介先生向北京大学正式提出编纂《儒藏》的设想，北京大学上报教育部，终于在200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我国这一重大学术文化项目立项，76岁的汤一介先生欣然受命，成为《儒藏》工程首席专家。

汤一介在思考《儒藏》

创办中国文化书院

谦和平静、儒雅从容的汤一介先生，能够成为《儒藏》工程的首席专家绝非偶然。这一切源于他深厚的学养和在学术界的德高望重。

汤一介先生1927年生于天津。父亲希望他成为有学问的读书人，因而取“一介书生”之“一介”为名。

汤一介先生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一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祖父、父亲也均以教书办学为业，汤氏家族的三代人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为家训，传承书香世家之风。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汤一介先生一直为发展、弘扬中华文化而孜孜不倦。他恪守学人之责任与担当，勇往开拓，鞠躬尽瘁，取得了著称于世的成果。其中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各地民办形式的书院逐渐消失，公办大学就成为国内唯一的高等教育机关。1984年，在汤一介先生和同事们的共同倡导下，中国文化书院成立，汤一介先生被选为首任院长。

在汤一介先生的领导下，当年的中国文化书院不仅聘请到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杜维明等70多位海内外的学术界著名大家学者为导师，更举办了许多大型的学习函授班和召开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为传播和研究中华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汤一介先生被任命为《儒藏》工程的首席专家时，中国学术界十分欣喜。他们称赞：“作为年届八旬的老人，汤一介先生不以颐养天年为乐，更不以金钱、名誉、地位等为求，而是汲汲皇皇地为中华文化的千秋大业和中华文明的传诸永世而恪尽一介书生之力，其志永固，其情可感，其愿撼天！”

最大心愿就是编好《儒藏》

《儒藏》工程是一项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的基础性国家文化工程，也是一项迄今为止人文社科领域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工程。

《儒藏》工程包括编纂工作与研究工作。编纂工作分为两步：先编《儒藏》“精华编”。该编将收入中国四部之书及出土文献中具有代表性的儒家典籍文献503种，韩国、日本、越南历史上以汉文著述的重要儒学著作150余种，共分编为332册，约计2.6亿字；第二步编纂《儒藏》“大全编”。该编将收入儒家经典著作3000余种，约10亿字；此外还要编纂著录两万余部“儒家经典文献总目”。研究工作包括若干子项目，如：中、日、韩、越四国《儒学史》、多卷本《中国经学史》、《儒、释、道三教关系史》、《中国儒学诠释史》、“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系列研究丛书”等等。

《儒藏》工程无疑是浩如烟海又繁琐庞杂的巨大工程，但汤一介先生义无反顾。他说：“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必须有中华文化的复兴来配合。今天，我们编纂《儒藏》可以说正在实现着400多年来中国学者、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梦想。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儒藏》编好，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之后一百年内不会有人超过。”

冯友兰先生曾说：“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团真火。这团真火要无穷无尽的燃料继续添上去，才能继续传下来。”

汤一介先生即是将自己的生命作燃料以传这团真火的人！

（摘自《党建》杂志）

非常好声音

●如何认识并讲述中国？作为一名中国作家，我们大多数人的表述是出于一种写作的惯性。但是，当我们要立足于误解的消弭和文化的国际传播，我们要反问自己，是否做到了跳出来、站得更高一点？

——作家**徐则臣**认为。

●电影也罢，小说也罢，总是以故事吸引人。但多少电影导演却不屑于把讲好一个故事当作拍片的基本功。在故事以外玩艺术形式感，玩导演自我意念，中国电影必衰亡。一部电影作品连故事都没讲好，还让观众从中去看什么“其它”？

——**陆天明**谈电影讲好故事的重要性。

●一个小说家要觉得自己是大师了，也基本就完了。一定要有普通人的感情，这才会了解别人的感情，你作为一个成功者，就根本不能理解别人，你只能了解一个虚幻的人，这个毫无价值。

——作家**格非**认为。

●艺术电影不能止于电影节，必须走向市场，启发观众。稳定的排片、固定的影院，可以让新老艺术电影观众慢慢回来。

——导演**贾樟柯**谈艺术电影。

●让孩子从小就爱上阅读，儿童文学作家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社会责任。同时不能因为孩子爱听故事，就把一些猎奇、不够严肃的内容，甚至一些歪曲的价值观传递给他们。因为我们是在培养孩子作为一个未来人的心灵的底色，而这个底色应该是明亮的。

——儿童文学家**汤素兰**认为。

●一个作家真正的视野是永远盯着自己，盯着自己的文化，盯着自己的生活，因为那个是文学需要表达的东西。如果一个作家说他具有“世界文学视野”，这个作家是不成立的，也是危险的。

——**毕飞宇**认为作家不必过多追求“国际视野”。

●这个时代，写诗是一种自我牺牲。诗歌被揶揄，是因为人们用实用的眼光来看诗，一切事物的价值都以货币估量。长期的‘不学诗’，因此‘无以言’了，现在对诗的攻击都来自‘不学诗’者。但新诗一直在发展，在丰富，在深厚。

——诗人**于坚**谈新诗发展。

●好的作家首先是一名好的读者，学会阅读和生活，才是写作的源泉。

——作家**阎连科**认为。

●从竹简、丝帛、纸张到电子荧屏，无论介质如何变化，只要写作者能够密切剖析人类命运和阐释人性的奥秘，只要写作者能够继续深刻地揭示人的命运和人性的本质，无论网络泡沫如何喧腾，文学就会永远保持着尊严与高贵。

——作家**辛夷坞**认为。

●面对市场，今天的文学少了一点骨气和抱负。文学的本义是引领和提升，而不是迎合屈就。文学要有勇气引导市场，引导消费。时代的美学风尚不能只是市场消极选择的结果，而应该是文学创造的结果。我们应该用精神的力量创造文学的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谈文学与市场。

●在这个时代做一个阅读者，如果没有自己的选择标准和一定的阅读基础，真的会眼花缭乱，所以要把底子打好，底子好了就可以区别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坏书。

——**周国平**谈阅读。

（张 彬辑）

神州

●热点人物

章开沅 请辞的资深教授

最近，华中师范大学给88岁的著名历史学家、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举行了荣休仪式，宣布章开沅卸任“资深教授”，离职休养。如愿退休的章老，作为人文社科界辞去资深教授第一人，他的请辞也引发涟漪。

章开沅先生 “荣休”

“资深教授”是人文社科领域的最高学术头衔，作为社科界的“院士席”，这也是一个高校里永不退休的岗位。身为华中师大最受尊崇两名资深教授之一，章老在几次口头请辞未果之后，去年年末，他向华中师大递上一份特殊的退休报告，并在里面这样写到“年迈退休，应属当然，荣誉可能终生，工作自有了时。”

章开沅说：“在现在的体制下，多一个资深教授就多一些好处，报项目中标的可能性就大一些。现在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数字上打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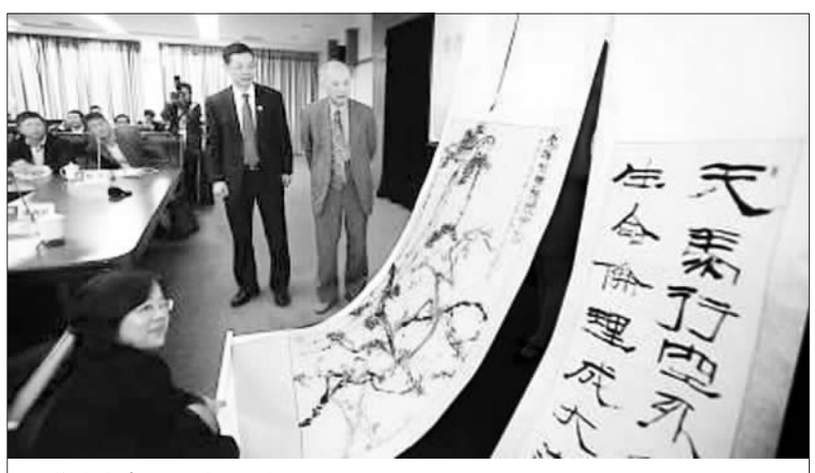
章开沅教授退休想法始自2007年，但从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到2013年华中师范大学110周年校庆，各种似乎“必须”出席的活动，让章老的欲退之念迟难付诸行动。奔走于全国参加各类研讨会，让耄耋之年的章开沅渐觉力不从心；而终生享受“资深教授”的优厚待遇，又让他深感内心不安。

因为在辛亥革命史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多个领域的开创性学术贡献，章开沅曾被众多媒体冠以“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的称誉，对此章老几年前专门投书媒体，请求为自己摘帽，“深恶以大言欺世。但世风日趋浮躁，动辄以‘第一’相夸”。在他看来，量化评审是学风不正的根源之一，他呼吁回归大学本位、教育本位，少一点评比检查指标体系。

在章开沅看来，如今大学各种资源都向有官位、有地位者集中，造成诸多学术不公。这位自1951年就进入华中师范大学任教拥有60余年高教生涯的老先生，多年来针对中国教育问题可谓诤言不断。而当年他以学者姿态掌校也一时传为佳话，在接受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一职时，他甚至讨价还价，每周要有两天独立做学术的时间。

章开沅说：“作为一个终身从事教育的人，我是陶行知的崇拜者，陶行知怎么讲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才是教育家。成天脑筋里转着怎么得点好处，这怎么叫教育家呢。”

“大学就像一座围城，体制就是围墙”，年近九旬的章开沅说，他想出去透透气，所以先拆了自个的围墙。而不当这个资深教授，老先生更多是希望对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有点推动作用，到了年龄干不动了就主动让贤，把更多机会让给年轻人。



弟子向章老赠送书画作品